聚焦文学新力量

谢络绎，女，现居武汉。出版有长篇小说《外省女子》等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到歇马河那边去》等两部。曾获第七届湖北文学奖新锐作家奖，第九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没有谁能真正置身其外

□马 兵 韩 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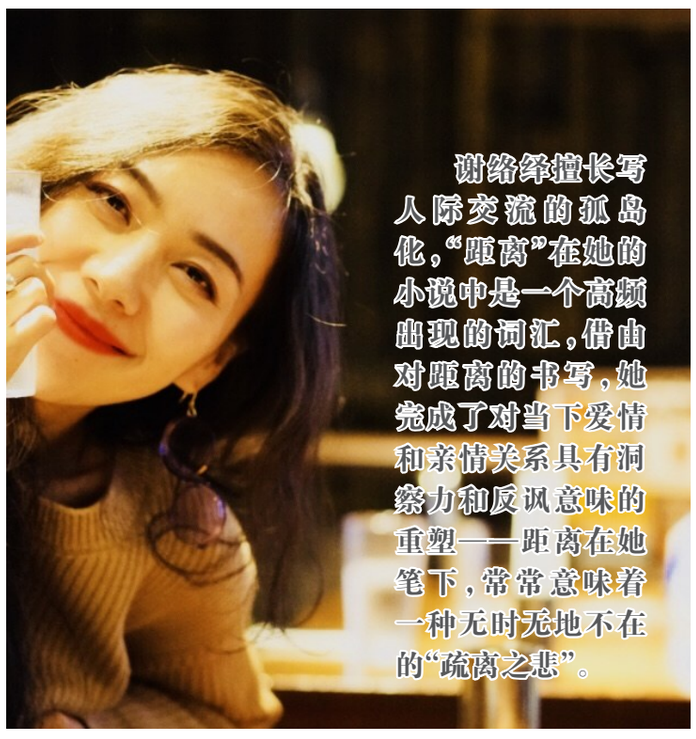
谢络绎写过一首题为《幸福》的小诗，全诗如下：“我脱胎于母亲的日常生活/又以叛逃为己任/她一步步向她妥协/我一步步向我逼近/我们越离越远/才有幸福可言。”这是一首对于中国式的亲情伦理作出精确又微妙传达的诗歌：幸福感与亲密感令人错愕的反比关系，无法分离而又必须叛逃的相处困境，人们都在一步步的“妥协”里逼近那个“幸福”之核，而这朝向“幸福”的旅程本身却是如此的悖谬和痛苦。这首不起眼的小诗实则关联着谢络绎创作的某种关窍，她确实擅长写人际交流的孤岛化，但与其他写作类似主题的小说家不同的是，谢络绎是从家庭或情爱关系的内部、从渴望和恐惧的纠缠中去观照“那部分真实存在又常常被人回避的正常的、不成功的连接状态”的。因此，“距离”在她的小说中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借由对距离的书写，她完成了对当下爱情和亲情关系具有洞察力和反讽意味的重塑——距离在她笔下，常常意味着一种无时无地不在的“疏离之悲”。

《耀眼的失明》中的陈馨因为不能为外人道的创伤记忆而不敢面对自己的肉体，与男友的欢会也必须在黑暗中才可以。为了克服这个心理的隐疾，她找心理医生疏导，又尝试以拍摄人体写真的方式逼迫自己对自己身体的凝视。小说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陈馨对曝光肉体的恐惧既是一种心理创伤的症候，但也隐含着对女性作为被凝视的“他者”这一命定身份的抗拒，无论在男友那里，在心理医生那里，还是在摄影棚的男性摄影师那里，他们一方面希望帮助陈馨完成对身体的祛魅，另一方面这种祛魅的后果就是女性身体的重新“客体化”。尤其是陈馨男友的态度，他希望陈馨可以通过人体写真的拍摄突破自己的身体禁忌感，但是又迂腐地强调必须由女摄影师来拍摄，他或许未曾想到，正是这种大男子主义式的要求更增强了陈馨对身体的禁忌。在这个意义上，陈馨在小说结尾处大喊男友的名字充满了一种隔膜的反讽感。小说不断在陈馨与恋人的身体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摆荡，前者的亲密无间叠印着类似于原罪的恐惧，而后者的渐行渐远更暴露了她距离意识的紊乱给与自身的巨大压力。

与之类似，《空港逆旅》写的是由名古屋国际机场而开始的一场旅行，这本应休闲惬意的旅行对男主人公陈耀来说，却是对心灵禁地的挑战。陈耀疏离于众人是为获得接近刘丽的机会，而当他们的关系逐渐从疏远走向亲密时，陈耀却“一下子醒了”，他惊讶于刘丽对他习惯的熟稔，“你知道我是谁？”这个疑问使陈耀心灵的防线更加坚固，如梦初醒般将刘丽拒斥在外。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所激起的却是读者深深的疑虑，小说中的距离时而是警心深密的算计，时而是水到渠成的依偎，繁复细腻的爱情就如此被情境化和隐喻化。

中篇小说《昏以为期》题目取自《诗经·国风·东门之杨》中的“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意思是两人约好黄昏时相会在老地方，却让一个人苦苦等到明星闪闪亮。小说前半段的线索也大致如此，在婚姻围墙内，丈夫郑长宏理所当然地承泽妻子勤恳顾家的雨露并怡然自得，当妻子积怨已久暴雨来临时，看似逃离围城的郑长宏却不得不面临婚姻失败并独自照顾孩子的窘境，尽管他有一天因儿子逃学去找妈妈而幡然悔悟，他却被永远的关在了围墙之外，再无复合的可能。无论城里城外，总有一个人在苦苦等待而另一人似乎不以为意，这种心理和时间上的“错位”不仅使夫妻二人背道而驰，更昭示了人与人感情的深在隔膜，并提醒读者没有谁能真正置身其外。

相比于爱情中的这种“亲密关系障碍”，亲情关系的疏离是更让人不忍的现实。《他的怀仁堂》中，范广荣与范斌父子虽然彼此记怀却不能走得更近，否则只能带来陌生和恐慌。即使是在父亲弥留之际，范斌依然无法通过肢体接触来表达爱意，“一想到永远无法让范广荣明白，他们彼此离得这么近，却再也不可能再近的时候，他就得赶紧转过身来。就是因为差着这么一点距离，范广荣的话到范斌那里，就有了奇妙的变形”。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拥抱了儿子，范斌头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胸膛有着那么巨大无边的“宽厚”，然而“他的身体猛然一缩，感觉自己消失了，从范广荣敞开的慢慢安静和冰凉下来的胸膛那里”——尽管他最终冲破了横亘在心里几十年的障碍，却再也无法弥补父亲在世时爱而不能爱的遗憾。



如果说范斌与父亲的距离受母亲离世和周遭环境的影响更多一些，那么由中国特殊的家庭育儿模式所导致的相互间的不信任而滋生的疏离感，在《多声部》中体现得更为强烈。妻子火星四溅的埋怨、岳母喋喋不休的说教、婴儿没完没了的哭闹，成为环绕在范斌周围的“多声部”，尽管他默默承受这一切，却依然不能获得任何理解与信任，想寄情花木亦不可得。这两篇小说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架构体现了詹姆斯·伍德所谓的小说的“微妙性——分析，质询，考虑，感受压力的那种微妙”，而“表现这种微妙只需要一个小口子就行了”，《他的怀仁堂》是养老，《多声部》是育婴，它们都有着新写实式的对生活情境的细腻甚至极致的观察，又流溢着巨大的反思性的心理关怀，即人们面对至亲之人所表露出来的疏离之感和由此映射出的生活的悲剧本质。

在谢络绎的创作中，还有一类是写武汉故事的，这个“外省女子”以自己热情的体悟和观察在众多已成气候的武汉叙事之外兀自找到一条生路，那就是书写城市化进程之下人与城的相濡以沫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居的乡愁”，其中代表作是《六渡桥消失之前》。既然是写武汉，这个小说自然少不了热干面般沸腾的市井气质，六渡桥出来的汉口女子许阿满甫一出场即是活色生香的，她的嘴不饶人，心软面硬，还有那些生活里的小聪明和小算计，不由得让人想到《生活秀》里的来双扬、《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不过谢络绎并没仅停留在对许阿满所代表的那种热辣城市性格的描摹上，小说接下来通过许阿满夫妇在老城的生活前史链接出一个“声誉满三镇，购物在六门”的六渡桥小世界，只是在都市化改造的大势之下，六渡桥的风情早已消失殆尽，惟有那些老户居民以记忆和厮守做着徒劳的捍卫。谢络绎在这个小说中不仅写出了一种对老汉口的留恋和渴慕，也呈现了这种渴慕在现代化进程中那珍贵的脆弱。小说结尾，许阿满和王汉生一路从新居走回到六渡桥大陆里，仿佛一次重访生命来历的追溯，王汉生固执地相信，即便六渡桥天桥拆了，“这个地方还在，从来都是这样”。然而，小说最后一句话以特别中性的陈述语调——“2014年12月1日晚上7点，六渡桥天桥主体桥面拆除完毕”——在王汉生的寄望中添了几丝苍凉，随着六渡桥大陆里老人们的逝去，他们充满个人体验的“当下的过去”最终将变成一种没有体验附着的“纯粹的过去”。谢络绎在小说中所体现的对大时代中的普通百姓的道德关切和那种“批判的抒情”，让这个市井故事有了更深沉也更悲情的人文底色，在经济和消费的助推之外，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的集体记忆是否也可以构成城市改造的内驱力，这确实值得思考。

谢络绎曾多次谈到文学之于她的意义和她对待文学的虔敬之心，她说：“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能将现实中稍纵即逝的某种体会捕捉后进行拉伸的力量，不单指向情爱，更多的是个人的迷惘和挣扎。”的确，从早期的《外省女子》《卡奴》到《少年看到一朵牡丹》《到歇马河那边去》，再到最近的《多声部》三部曲，她写作格局的拓展和创作观念的嬗变是显而易见的，她越来越能超逸于游移不定的感性叙事，为作品注入更广阔的思考和对人生更冷峻的观察，因此，其小说体现出越来越丰沛的现实指涉力和对社会问题的勘探意识也就顺理成章了。

■创作谈

一棵树与一角天空

□谢络绎

前几天朋友通过微信发来一张杏花盛开的照片，背景是一个旧式庭院，有斑驳的大红门和老砖院墙。由于角度问题，它们看起来有些突兀，像是误入镜头的路人，呈现出的是随意、粗糙的一瞬。然而满枝胜雪的花朵依然是澎湃美好的。于是我们就谈论起美来，谈论起这样的照片所展示的美是杏花本自具足的美，提供的信息仅仅是，花开了。

花开了，这是时令之必然。大自然的一切都行进在即定的秩序中，不同的形态在相应的时间中静静呈现，你见或不见，它都在那里，有心者总能看到。用心者则会作出适当的回应。这当中感受力更强的人，他们的回应是创造性的，会在自然美之上有所发展，展示出更多更具感染力的美。

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存在着一个使万物之间的关系由暗到明予以浮现的任务。萨特说：“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关联的。”这当中的“我们”，指的是写作者。

在我还没有开始写作时，我在企业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招兵买马。年前年后，我总会去各大高校进行校园招聘。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急于寻找出路的学生，他们青涩的脸上闪动着怎样的迷茫。我想给所有孩子机会。我在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其实我要做的很简单，在他们中间找到合适的人选，完成差使了事。可我总会想太多，想做更多，想做的事更有意义。”

此“意义”并非事情本身成就了什么，而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探究，是对事物缘起缘灭，对个体甚至是人类总体命运的穿刺。这当中尤其令我着迷的是一种隐蔽的、没有实体、却往往起决定作用的内容，关乎规律，连锁的美，坍塌的根源等等已然存在，却总待去获得揭示的关系。关系的建立即意义。大约便是这种凡事都要找到“意义”的动力促成了我的写作。

我的短篇处女作《到歇马河那边去》写封闭空间内情欲的毫无边际，单独来看，空间与欲望似乎毫不相关，是萨特所说的“我们”在找寻这种相关，使其呈现出类似于“一棵树与一角天空”这样的不惟一但独特的关系，它们一旦被建立就必然会声张出独属它们的内在逻辑。

某天，我读到巴基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经历，他童年流落黎巴嫩，重返故土时，他们的比尔瓦村已不复存在，他们向北走，在阿萨德村落脚，以色列人占领了那里，给予他们这些“非法”进入者的身份是“缺席的存在者”，即肉体上是存在的，但没有明确身份。又有一天，我听到一个身边人的故事，海子卧轨自杀后，有人自称海子，到武汉来各种约见，人人都避而远之，因为这着实是一件既惊悚又因为受到欺骗，令人深感嫌恶的事。却偏偏有一位朋友，对来者尽信，每来必见，见则好吃好喝地招待。

多么荒诞，又如此确凿。

两个故事都涉及身份，一个是消失的存在，一个是存在的消失。我于是写了一个基于此而进行拆解的小说《倒立的条件》，写了这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有一天他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女主角面前。而女主角正深陷绝境孤立无援，这个对女主角有过深深眷恋的男人是来帮助她的。他的出现令她恐惧却成为她惟一的希望。这是我虚构的幻觉般的遭际，一直到动笔之前，我仍在为事情生发的内在动力寻找依据，绝境是我能够想到的惟一合理的条件，它是消失和存在的翻转场。

空间与欲望，消失与存在，我不是这些内容的发明者，是使它们发生关系的人。“使……发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捕获和揭示的过程。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创作就如打开的水龙头，成为自然而然的，人物、事件，他们的所思所想，一个接着一个就出来了。我十分珍爱这些流出，视为上天的恩赐。就像所有人都对树和天空不陌生，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使它们产生美的关联一样，流出之物是我的树和天空，它们的关系看起来是结构性的，实际上是感性的，我的能力缘于我是少有的对它们投入了感情的人，始于无意识，训练于有意识，我越重视它们，它们乐于前来的就越多。

比如我写《六渡桥消失之前》，首先是六渡桥来找我，然后是大陆里，接着是个中人物，许阿满、王汉生，他们的女儿王竹等。武汉这座城市中的旧故里与新事物，老人与年轻人，这些变迁的承担者，我要想认清变迁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规律，就要将他们和它们捧于掌心，我越是这么做，越是愿意在其中停留，隐秘的本质就越容易在所有这些事物的关联中浮现。

这一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万物丰厚而生命有限。“然而人们依然觉得生命享之不尽……”笛卡儿带着这样的忧虑不遗余力地追问“我”是什么。作为写作者，作为萨特所说的“我们”之一，我乐于在有限中追问无数个“一棵树与一角天空的关系”，看到制约，也看到自由。

■新作快评 津子围中篇小说《长大一相逢》，《芒种》2017年第11期

浓缩版的家族小说

□贺绍俊

津子围是一位脚踏实地、执著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叙述空间很大，无论写都市白领还是普通市民，无论直面现实还是回望童年，他关注的都是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中篇小说《长大一相逢》就是这样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

作者所感的是亲情。谁都有父母，有亲戚，有家庭，而亲情是维系着亲属、亲戚和家庭的重要因素。小说题目“长大一相逢”来自唐代诗人李益的一首诗：“喜见外弟又言别”。这首诗写的是亲人之间真挚的情谊。津子围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家族的亲人们相互之间来往的故事，但让他心生感慨的并非家族亲人之间的融洽亲情，而是他发现，在这份亲情中再也寻觅不到李益诗歌中的意境，虽然同是“长大一相逢”，但相互之间都在为各自的利益算计，亲情不再是亲人间的情感交融，而已经沦为一种伦理形式。小说采取第一人称，从父亲去世开始写起，在父亲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来参加葬礼的亲戚只有三位，这个结果令讲究礼节的家里人感到极度失望，更没想到的是，三位亲戚的出现，又在全家生活的池塘里掀起了微澜。亲戚们为了送钱的事情相互之间产生了隔阂，表面上的客套和应酬掩饰不住内心的冷淡。作者由此撕开口子，一步步触摸到城市伦理的痛处。城市不像农村具有浓厚的家庭氛围，城市人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因此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而不会把家族和亲情置于特别显要的位置，甚至会把亲情作为一种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

小说人物宋连胜在农村长大，后来到城市求发展，曾四处找亲戚们借钱做生意，借了钱不仅不还，还抱怨要他还钱的亲戚不是好人。终于逮住机会发了财，成立对外贸易公司，当然要在亲戚前面炫耀。宋连胜在亲戚中的名声很差，但他又是家族意识最浓的一个人，他发财后的愿望是组建一个宋氏集团公司，把宋家的兄弟姐妹都招到集团里来。“我”的经历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亲情难以维系。亲戚们常来造访“我”家，“我”也尽量给予帮助，但妻子说我俩的婚姻不能捆绑上你的家族，七大姑八大姨都连扯带挂，令她不能忍受。而“我”则认为妻子太自私，也不近人情。两人开始由冷暴力到恶语相加，以致最后彻底决裂。父亲葬礼上亲戚们的表现再一次刺激了“我”，于是开始梳理亲人之间的关系，反思亲情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这篇小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的家族小说，家族小说的所有元素它都具备了，更重要的是，小说的主题深刻触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意识。津子围从日常生活的细节进入，让童年回忆与现实生活相对应，映照出亲人间曾经温馨的亲情在今天是如何逐渐淡化甚至僵死化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在传统社会中不仅是血缘关系，而且也是基本的生产关系，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密切相关，只有在这种情景下，传统伦理才具有较大的约束力，而亲情则起到润滑的作用。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家族基本只具有血缘上的意义，个人利益不再被家族利益所压抑，而且新的社会伦理要比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传统伦理对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个人命运不再依赖于家族命运，人们也就淡化了家族关系，亲情也就变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存在。小说由亲情扩展到家族意识，津子围正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家族故事探讨家族意识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我”经过一系列的事件终于明白了家族意识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趋势，“这里有理的问题，也有情的问题”。

津子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客观反映家族意识衰落和亲情丧失的现实。在这篇纯粹采取日常生活叙述方式的小说中，他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细节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这突出体现在黄巧玉和“我”这两个人物的言行上。黄巧玉和“我”是这个家族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家族的涣散和亲情的丧失怀有深深的忧虑，也有意要将家族凝聚起来。津子围将黄巧玉塑造成了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现代女子。她提出要建立家族的教育基金。这一设想很有深意，说明她抓住了传统家族意识衰落的根本。传统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已经难以解决家族之间的矛盾，只有让家族的成员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以现代文明改造传统伦理，才能使亲情正常化。“我”一方面非常赞同黄巧玉的建议，但却认为家族不过是人类大树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枝蔓，不妨从人类进步的角度去对待家族的衰落。他们两人对于家族和亲情的意见还真有点相反相成的味道。津子围也不表明他赞成谁，而是让“我”不小心点击了删除键，将邮件的内容全部抹掉了——这才是小说的结尾，它把思考的接力棒扔给了读者，相信读者自会得出最恰当的结论。

■评 论

重申地方与文化的力量

——评费振钟的《兴化八镇》

□黄 玲

费振钟的《兴化八镇》是一部沉静之作，扎实厚重而又真正及物。作者用他的博学、理性、善思，以及对当下社会现实强烈的介入冲动，在当代文学乡愁弥漫抑或苦难泛滥的乡村叙事之外，找到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言说方式。

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叙事方式。不是因为好读，恰恰是因为并不好读。读起来不轻松的原因，一是由于叙事中浓稠的知识密度。其间包含了大量的相关知识，可谓干货满满。第二是因为作者的笔触很多时候不是朝着时间纵深推进，就是沿着空间立体描述，对于不是很了解兴化的历史和地理的读者来说，得不断展开时空想象才能理解其内容。另外，作家叙述中的问题意识和思考习惯也使得阅读变成了一场不能松懈的思想长跑。知识和思考的大面积覆盖给阅读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形成了全书不抒情、更不煽情的叙事基调，克制、内敛、理性、沉稳的行文方式使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质感，它吸引读者在浮躁中一点点生出耐心，一字一句地看完，并随之获得渐渐饱满的阅读愉悦，是那种能让人咂摸滋味的文字所带来的愉悦。

当然，《兴化八镇》更值得称道的是它的态度与立场。对乡村的关注、对文化的倚重、对地方的重申，撑起了这部著作宏大的气象以及超出一般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文化意义与历史意义。

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开始慢慢影响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各个方面，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乡村随之衰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乡村在文学作品中被描绘的形象也一直在变化。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乡村被美化成诗意的世外桃源，寄托着城市人心头浓郁的乡愁，抚慰着那些为现代生活奔忙的疲惫灵魂。2010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问世，面对着中国乡村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作家郑重而严肃地提出了对乡村命运的担忧。总体来讲，真正关注乡镇命运的作家还不是很多。即便关注乡土，多的也都是对底层、边缘人们生存状态的描写，真正把乡镇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察对象，并为它的命运付出专注观察和思考的，少之又少。《兴化八镇》的出现几乎填补了文学作品中此类题材的空缺。作为乡土中国的基层组织，乡镇如同中国社会的细胞，它的命运关乎整个社会的结构，关乎我们每个人看不见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下中国乡镇发展遭遇诸多问题的今天，作者以其现实的关切、谨慎的思考、敏锐的洞见，用文学的纤笔触碰如此坚硬而重大的现实问题，它的意义不言而喻。

《兴化八镇》是在今天传统乡镇社会衰落和解体的现实背景中展开观察的，它首先是一份客观的记录。作家经过数年实地探访、调查研究，写作视野很宽，底气很足。书中涉及到了兴化地区的渔业、种植业、窑业、手工业、旅游业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全方位地观察了兴化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等诸多方面，几乎可以看作一部地方百科全书。但是，除了呈现，更重要的，它要表达的是对如何重建乡镇社会的思考。

这本书拒绝任何形式的抒情，而是用脚踏实地的态度寻找应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在乡村分崩离析之际，还想依靠什么来挽回，那么除了文化的力量外，应该别无其他。”可见作家对文化的倚重。他从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出发，试图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寻找到能给乡镇的今天和明天以某些启示的答案。文化在书里不仅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前提。全书八章，分别考察兴化的八个乡镇，每个乡镇的考察重点皆不相同，但路径都是一样的：从文化中来，到文化中去。在作者看来，乡村社会当下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以农为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被瓦解后乡村内在秩序的消失，而这恰恰又是乡村社会延续的原动力。因此，要重建乡村社会，首先就要通过恢复农民对土地的信仰，重建乡村社会共同的价值伦理，而它正有赖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尊重、发掘、继承和重构。

近年来，费振钟长期生活在基层，关注着地方，致力于泰州地方文化的整理与弘扬，“兴化八镇”就像一面旗帜，立场鲜明地捍卫着地方的尊严。这部书以乡镇这个区域性的地理空间为对象，选取了兴化八个典型乡镇：沙沟、安丰、钓鱼、戴窑、竹泓、垛田、茅山、边城，把每一个镇都看成一个生命运作系统，通过史书和自己脚步的亲身丈量，以罕见的叙述耐心书写了这八个镇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

如何理解地方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理解中国。针对乡镇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本书从兴化八镇出发，探索如何在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中寻求新时代的生机。兴化八镇是中国地图上一个小地方，但《兴化八镇》却是一部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延伸思考的大作品。